

中美中东战略

论中美全球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与中美中东合作*

赵葆珉

摘 要: 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但双方的安全竞争具有低烈度性,处于可控范围内;在中东地区,中美战略利益存在结构上的互补性,双方在防扩散、反恐、反海盗、维护自由通航、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维护海湾等中东国家的局势稳定等方面,尽管存在分歧,但拥有共同利益和认知。中东既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战略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运筹大国关系的支点和平台。未来中美在中东的战略协作将继续在结构性互补的框架下展开。双方需要以开展中东热点外交为抓手,拓展中美在中东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使全球视野下的中美战略合作拥有更加稳定的平台。

关键词: 中美战略互补性;中国和平崛起;大国中东政策;中美关系;战略利益

作者简介: 赵葆珉,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42)。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2) 04-0073-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西安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回归欧亚大陆——中国大战略转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大国兴衰意味着世界权力与财富的不断流转,也意味着新旧主导力量的冲突与纷争。^①数百
年欧美强权的兴衰演绎延续着相似的轨迹,即大国崛起通常是通过军事冲突实
现的,依仗军事暴力打破既定权力格局,以战争与人类浩劫为代价强行突破,

① James E. Dougherty,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ongman, 2001, pp.309-310.

是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因而西方经典的学术著作，视战争为世界霸权更替的必要手段，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就是其中的代表。^①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存在重要的安全利益竞争，但是从全球的高度来看，中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兼容性——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未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在此条件下中美在次区域格局往往存在合作的可能，如中亚、中东、反海盗和其他低级政治类的问题。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滥觞，也没有重蹈美苏权力争夺的敌视与遏制的冷战覆辙。经济融合与竞争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基础，经济竞争带来的财富转移也取代传统的军事暴力成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手段。中美如果携手实现权力的和平让渡，必将树立大国权力和平沿革的先例，走出权力转移必将导致战争、强则必霸、霸则必战的怪圈。

一、霸权兴衰视野下的中美权力结构

冷战结束 20 年来，中美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其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美国维护全球领导权和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积极拓展民主，而中国致力于经济利益的拓展和经贸合作，注重民生的改善。经过 20 年的和平建设，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持续遭受围堵的安全处境，且海外利益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战略兼容性构成中美和平竞争的战略背景。中美战略兼容性包含三重因素。核均势奠定中美关系稳定的战略框架。战后核武器的诞生，传统大国均势演化为核均势，中美竞争即在这一军事安全背景下展开。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共同毁灭，将中美竞争限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事关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争夺上。互利双赢的经济融合与经济力量兼具变革与保守的双重性质，缓冲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中美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形成了稳定变迁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趋势并存，但合作大于冲突，即是经济力量这一双重属性的产物。战略互补性形成中美战略规避——美国在全球维护政治和军事领导权，中国维护自己的海外经贸利益，二者总体上并行不悖。中美和平兴衰在政经分离的总态势下展开，美国垄断国际权力，倡导民主，而中国在经济上凸显国家意志，倡导民生，潜在的结构性的冲突因而没有妨碍中美战略合作与力量对比的缓慢变迁。

^① See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1. 核均势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尽管中美核武库数量差距较大,但跨越冷战的中美竞争更像是战后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的核心,美苏冷战只不过是这一世纪性竞争的序曲。^①挟百年和平建设蓄积的国力,战后美国在西欧列强衰落的废墟上,成为与苏联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②中国百年衰落,经过无数次的战乱、革命与外敌入侵,开始奠定坚实的中央权威。中美不对称竞争首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在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开始了崛起与围堵的较量。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首先是中美冲突的产物,更具有中美对抗的性质,美苏冷战只不过是这一斗争提供背景。二十世纪70年代后中美战略携手,美国并未因中美战略趋同而弃持台湾这枚遏制中国大陆的潜在棋子。围绕台湾的争议展示了中美争夺的性质。中美又建立战略联盟,携手拖垮了苏联,显示了冷战大背景下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③

1991年苏联解体是中美关系新的起点。战后核力量渗入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大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权力争夺的经典模式越来越难以奏效,以往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势下大国争夺被束缚在有限而单纯的选择之中,变得理性和易于妥协。中美苏三大国共享核均势,维持了整体和平。冷战后,核均势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核均势的守护者。^④核均势决定了中美竞争将延续冷战争争这一和平态势。美国因苏联解体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胜利缺乏实质性意义,它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大国竞争。核均势决定了美国只是博弈型霸权,只能以“离岸平衡手”的方式,通过大国妥协取得霸主权威。^⑤

美国对华遏制是持续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的优势是常态,中美竞争延续并凸显近代以来中国的困境:始终在西方强势下实施民族反围剿。中美关系中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源于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结构性冲突^⑥,其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全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中国被迫适应大国角色,

① Judith E. Kornberg and 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A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5, Introduction.

② See Edward A. Olson, *US National Defen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rand Exit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2002.

③ 参见倪孝铨、罗伯特·罗斯:《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James Bellacqua,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⑤ 马杰:《跨国公司:福祸兼备的经济怪物》,载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⑥ John Marshi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01.

且中国享有上升大国的多重优势。中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唯一与美国战略冲突而没有落败的大国；中国发展带来的权力转移构成格局变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国的精神优势，比美国更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部大国兴亡史即是一部以弱为强、以小克大的历史，巨大的不对称竞争压力激发中国的进取精神与活力，且从整体来看，大国权力消长的时间在中国一边。

和平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核均势给予中国基本的安全保障，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悬殊之下形成不对称竞争。中国保持战略克制，韬光养晦，目标稳健而务实，没有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明确界定，而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竞合的有利位置。这一规避隐忍战略，依托于单极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实现崛起，缓冲了美国的敌意。经过冷战洗礼，大国关系更具理性与和平性质。中美拥有稳定成熟的竞争框架，没有使全球笼罩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杀中美竞争的绝对本质。潜在的结构战略竞争不时浮出，形成中美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冲突热点。

2、中美战略互补性

核均势下中美战略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有限冲突与被迫合作并存的特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背景。和平崛起是一个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是史无前例的战略尝试，它刷新了大国兴衰血腥争夺的历史，使一项崇高的战略追求适合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并创造了隐忍待时、以弱为强的外交战略。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首先以军事扩张建立权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国竞争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与领土争夺。超越于此根深蒂固的范式，中国和平崛起依托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触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而以经济缓进和平突围，将国家战略糅合在经济互利之中，尤其是以经济外交为手段，发挥以柔克刚的作用，以经济累进蓄积国力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战略取向存在明显的互补性。美国满足于权力垄断，专注于地缘政治扩张和民主化运动，而中国不随美国起舞，依托核均势摆脱了传统大国崛起背负的沉重军备消耗，以务实的经济发展培植国力，在外交战略上奉行民生先行的方针。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竞争并在外交理念上保持战略兼容，经济融合与政治安全并存。中美争夺并形成并行不悖的战略互补性，双方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协调竞争，依靠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模糊形成了稳定但具有潜在冲突的权力结构。20 年中美关系交替表现出冲突与缓和的倾向性，呈现出竞争与依存的双重性质。争斗本身以及争斗带来的战略机遇期的延长，

客观上成为一种权宜均衡，为中国在经济上展现活力客观上提供了时间。

战略互补性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物，它缓冲了中美长远的结构性冲突与竞争的不妥协性，避免中美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安全困境。在相当长时间内，战略互补性使中美冲突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趋向具有兼容性，安全局势的变化非常稳定，不易触发明显的对抗。尽管存在浓厚的战略猜疑，中美并未走上实质性对抗的道路。20 年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平衡下维持了总体和平，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战那样分明。中美陷入大国战争的宿命并未发生^①，中美关系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享有单极主导地位，而中国崛起没有遭受持续的围堵与遏制。

多极权力格局与美国战略失误也促成了中美战略互补性。和平崛起并不是自我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地区冲突的阴影挥之不去。多极化弱化了美国霸权的锋芒并缓冲了中美竞争，它始终是中美关系转型的牵制力量之一。美国背负全球霸权的重负，时时面对遍及全球的矛盾和冲突，不能持续集中关注中国崛起。中国在险恶的环境中韬光养晦，缔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美国囿于冷战经验，以军事威慑辅之以市场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企图以此促成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结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国崛起。“9·11”事件后，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任务，加剧了美国的战略混乱，使中美互补、互惠、互利的战略机遇期得以延续。

二、中美权力消长的和平性与包容性

中美竞争不能撼动冷战后大国核均势铸造的战略平衡，战争作为传统大国竞争的权力转移手段难以奏效，中美和平兴衰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来实现，即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差异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力量源泉。中国以经济增长拉动国力，而美国由于经济衰落逐渐丧失霸权能力。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传统大国的相对衰弱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相对力量上升形成反差，2010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是这种经济总量变化的标志。不可否认，无论从军事能力、政治话语权、经济总量、科技创新能力和文化力量哪个方面来看，美国在全球都拥有独树一帜的力量，尤其是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联盟体系成为支持美国霸

①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4-128 页。

权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拥有财富创造力的中国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和长期战略潜力，全球力量的此消彼长，其时间在中国一边。

1、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和平共存以国际权力的转移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为背景。国际权力转换意味着中美关系不能固定在静态的权力对比上，它将顺应无常的权力转移而起伏。核均势施加的抑制性约束，使中美关系摆脱了传统大国兴衰的常规模式，经济力量因而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变化的新因素，它兼具和平与变革、保守与进取的双重性质。这一奇特的稳定与变迁力量使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稳定的动态演化之中。美国满足于政治霸权与军事暴力，在围绕创造财富的竞争中不得不付出较大的成本，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则彻底扭转了被持续围堵的困局，大大推进了多极化进程，使国际体系的转型有望在和平环境下实现。

经济快速增长是中国对美遏制政策的战略回应，是打破美国战略包围的突破口，它将战略上的持久与出奇制胜融为一体，给予中国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经济缓进旨在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以军事暴力强行突破的滥觞。在美国的一超独霸面前，中国总体上奉行“超脱政策”，在国力不济的时候，避免即刻决战，而是采取拖延战略，通过持久的消耗削弱对手，促使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方向转移，最终逆转敌我优势对比。这是传统兵家转弱为强的经典智慧。而避开历史上其他大国奉行的进攻路线，避免正面突击，选择阻力最弱的途径，以间接迂回达成战略奇袭，这种发展道路经常是达到目标的捷径。^①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②

经济的和平性质缓解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妥协的战略共识，经济竞争取代军事暴力成为中美力量变迁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成就成为中美政治和军事权力运作之下的潜流，在霸权围堵中造成适应自身发展的和平稳定机制。经济缓进不会即刻导致美国单极体系的根本垮塌，可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中国崛起争取机会和空间。经济崛起的前景尽管具有不确定性，妥协与互利共赢是经济竞争的方式，可以调和冲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两败俱伤之中。经济融合冲淡长远的安全隐忧，弱化安全威胁，避免相对优势流转触发动荡。中美在历史性的磨合中逐渐习惯并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崛起因而并未伴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霸权国与崛起国和平

①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1991, p. vi.

② 孙子：《孙子兵法》，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 页。

共存的局面。

经济力量同时显示出变革的性质，促成中美权力的此消彼长。经济权力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续的经济流变引起实力变迁。中美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各异，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得均衡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渐改造旧有的力量体系和利益范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中美整体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同时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与周边大国的和平共处，冲销美国同盟体系并促成自身军事现代化。经济实力缓慢变化，改变着对美关系的主动地位与政策杠杆，促成中美权力均势。中国逐渐不再被动撑持，而是以模糊和妥协为特征的韬光养晦政策采取柔性措施。单极体系的军事锋芒，被多极化的和平潮流所牵制，为未来中美这一权力转换铺平了道路。

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长达 20 年经济力量消长产生了与传统大国竞争一样的战略效应，逐步改变了全球军事与政治平衡，促成中美军事力量变迁与地缘政治分野转换。核均势下中美军事力量转换的根基在市场，经济竞争决定军事优势的浮沉。中美军事力量消长，不是战场决胜的产物，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经济力量消长侵蚀了美国一度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推动中美军事权力不断变迁，美国支配全球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又会对经济构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中国不断积累的财富从长远发展来看将持续转化为军事效能。中国力量提升与美霸权的衰弱相伴，固有的地缘政治分野逐渐落伍。适应不断更新动态战略框架，中美需要经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和利益范围。

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竞争更具有可控性与低烈度性。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结构性差异。美苏竞争是全方位的争夺，而不对称竞争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美苏较量势均力敌，彼此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下，以军事冲突为特征。美苏争夺持续半个多世纪，几度起伏，权力优势一再易手。中国以经济进取缓慢崛起，中美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似乎无所用心，浑不着意。经过 20 年的发展，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摆脱依附性发展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而美元霸权和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下探使中美关系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中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二战中中国以持久战拖垮日本的经典战例。在抵抗战争中，积弱贫穷的中国依靠自卫战的武装民众使日军陷入了游击战泥沼，以 8 年漫长的持久战争挫败了日军兵锋，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在冷战结束以来艰难的战略防御战中，中国以市场纽带协同自我进取的民众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提升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是本土财富支撑的消耗型帝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扩张都使其经济根基更为脆弱。在中美不对称竞争

中，中国避开美国的军事锋芒，使美国在过度扩张中丧失了战略能力，同时虚实就虚，在经济竞争中击中了美国霸权的“软肋”。让渡与分享权力成为必然，单极霸权即和平过渡到中美均势体系。

2、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失

中美兴衰开辟了大国历史的新纪元。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兴衰，借助于经济力量的缓慢转移，以战略互补性避免冲突，中美合作实现了大国权力的和平让渡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在一超多强的冷战后格局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经济发展获得大国权力，中国崛起打破格局带来的冲击，被中美战略互补性所缓冲。政经分离的战略互补性同时造成中美权力的缓慢演变，形成彼此残缺而互补的双重权力结构。中美共享大国权力，彼此均不能独立支撑国际体系，为中美携手应对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基础。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侵蚀了美国的财富基础，造成了美国政治与军事霸权悬空，预示着中美和平兴衰将继续向纵深演进。

在单极霸权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弱势。过去 20 年中国处于单极体系的边缘，时刻面临西方大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围堵，在意识形态上遭受持续的围攻和打压，被迫以经济迂回累积国力。迄今为止，中国的和平崛起集中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并致力于经济成长，而不是关注国际权力体系所应采取的形式。传统大国崛起以弱为强，争锋于白刃之间，危然后安。和平崛起隐忍待时，依赖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与美国编织的国际关系获得经济与安全利益，没有权力基磐与缺乏内需市场的廉价崛起蕴涵着潜在战略风险。^①中国的经济利益遍及全球，而维持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国守护，注定了中国崛起在战略上不得不维持现状而不是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迄今为止，中美权力交替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平崛起决定了军事力量对比是中美力量消长最为滞缓的领域，这一权力构造构成中美战略互补性的客观基础。经济力量并非直接的战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转化为战略实力。经济力量向战略实力转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期，这一滞后效应形成冷战结束以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为中美战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这一滞后期也使传统霸权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分裂，形成中美共存、共荣的经济与军事权力，中美利益具有共生性。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不能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只能依赖经

① 寺岛实郎：《成熟太平洋国家日本的构想》，载《中央公论（日本）》1996 年第 3 期，第 20-38 页。

济力量消长缓慢冲销，决定了中美军事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和平崛起也包含着难于兼容的双重战略取向。中国需要促成权力持续变迁，以弱化霸权围堵与既得利益障碍；同时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护卫经济成长。^①中美和平兴衰造成不完全权力转型，国际政治权力与经济秩序脱节，全球军事权力对比不能反映经济力量分布。伴随着 20 年财富转移而来的是中美不平衡性权力构造，中美战略均势在权力分裂中形成。如经济力量向亚洲转移并未伴随政治力量的直接跟进，覆盖东半球关键地带的大中华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中国缺乏支撑战略转型的大国军事资源，而美国拥有环球最强军事力量但丧失了财富基础。

一般认为，大国争夺以财富为后盾，财富控制权力是国际体系铁的逻辑，丧失财富注定了美国霸权的长期命运。在核均势下，大国直接的军事较量被抑制，相对军事优势不再生死攸关，而经济力量可以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成为大国实力的核心部分。经济力量消长为中美权力转移确立潮流，军事、政治都在经济设定的轨道上运转。大国竞争摆脱了武力争夺，意味着美国不能以战争手段维持霸权，不能借助军事权力解决财政危机，如同苏联在军力巅峰时期不能阻止经济崩溃而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经济衰落侵蚀了美国强权，过度战略扩张后被迫收缩。中美力量对比随财富浮沉而变迁，全球权力体系日渐与此相适应。

三、中美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分析

后冷战时代中国以一国之力抗衡美国的单极体系，并在 60 余年艰难的战略防御中摆脱了被遏制的处境，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改善，成为以经济重新聚合的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力量自然地突破狭小的东亚，转向与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区域，区域一体化成为重要抓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领导地位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这种战略兼容缓解了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结构矛盾，也构成中美中东协作的客观基础。

近代以来，中东是东西方力量交汇的锋线，也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逐渐被侵蚀。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中东时代，如同在东亚一样，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战略上处于一种收缩

^① 陆克文：《西方应对中国崛起需建立新汉学》，载《参考消息》2010 年 4 月 29 日，第 16 版。

态势，2011 年底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新的战略态势为中美中东协作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战略根基在东亚，而同时从海陆两线与中东邻接。中东是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起点，是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和中国在多边舞台上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也成为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试验场。

1.中美协作促成中东多极均势

中东体系转型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霸权衰落的自然结果。单极体系下的美国是 500 年来第一个非欧亚力量取得全球霸权，也是 200 年欧美霸权的延续，美国霸权的丧失对全球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中东也由此处于深刻的权力重构之中。迷恋霸权的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成为中东矛盾与冲突的核心。美国得以在混乱中延续霸权，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对手的谨慎和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权和实力。如同在转型的多极化世界中，2011 年中东阿拉伯剧变以来，中国在新中东秩序中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中美在政经分离的大前提下，将竞争舞台推向中东，将成为在中东合作的起点。

2008 年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力量逐渐萎缩，其让位于以伊斯兰复兴为基础的区域协作。伊朗核问题的扑朔迷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回归伊斯兰，“阿拉伯风暴”后埃及、突尼斯等亲美阿拉伯国家外交的调整，是美国中东霸权面临转折的集中反映。土耳其与伊朗重新占据失去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重要力量。伊朗历经数十年围堵封锁，在逆境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弱之后，伊朗成为新中东秩序的重要力量之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游刃于多种力量之间，避免与西方对抗或敌视伊朗。阿拉伯国家视土耳其为平衡力量，欢迎土耳其回归中东伊斯兰世界。均势正在伊土之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显现。在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实力下降，而中美保持竞争加合作关系，作为离岸平衡手维护中东局势的稳定性符合双方利益，尤其是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符合双方利益。

中东秩序变迁呼唤权力的调整。维护中东局势稳定、打击索马里海盗、阻止中东核扩散、确保能源供应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卷入中东混战而陷入冲突的漩涡中，经济影响力削弱与外交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①美以特殊关系的困扰与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错误中东政策，使美国丧失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中国的出现将加强中东多极制衡格局。

① 彼得拉斯：《美外交军事化只因丧失经济影响力》，载《参考消息》2010 年 8 月 23 日，第 3 版。

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和平崛起这一原则，超脱于地缘政治争夺，推行无冲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携手驾驭权力转型，中国发挥均衡作用，既通过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行为，又与美合作维持中东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经贸成长与权力的有序转移。

2.中美在中东合作的核心

中东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区域，商业纽带是中国与中东更深远的地缘政治联系的核心。中国沿海陆两线同时迫近中东，复活与海洋生命线并立的大陆经贸系统。如同在全球层面一样，中美中东协作也将在政经分离这一大原则下展开。美国中东政策由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如反恐、防扩散、打击反美国家与保护以色列安全)，而中国与中东关系建立在务实的能源利益和贸易上。美国纠缠于权力争夺和推行民主价值观而中国致力于经济利益拓展和改善民生，以和平手段促成海湾国家摆脱对美经济与军事依附，促成以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沙特多元权力构造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多元格局，中国将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接触中心。伊朗大国地位是中东构建均势的关键，维持中东均势是中国新中东政策的起点。中国日益强盛即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强大的战略依托，中国成为平衡西方的重要力量。

中东是中国周边的战略延伸，蕴藏着中国经济崛起的契机。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经济融合冲淡军事冲突，预示着经济在中东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为新兴的全球力量，致力于经济拓展的中国，没有浓烈的军事意味，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战略潜力。中国成为中东能源市场与投资对象，中东成为中国制造商品的消费地，双方的合作具有互补性。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将在中东获得推动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之一，海湾资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力量转移必然伴随着储备货币的变迁，中东诸国与中国经济融合将孕育新的储备货币。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摆脱对美元依赖，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产生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效应。中东是中美力量最终消长的节点。中美和平兴衰的权力让渡将在中东表现出来。核均势下大国争夺的根基在市场上，大国兴衰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如同在全球层面一样，中东也将在核均势的整体框架下实现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经济发展能够产生长期效果，成为一国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因为地缘政治格局和军事与政治优势的对比，将随经济力量消长的潜流而持续重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滥用武力，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为经贸主导的和平战略提供契机。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在历

史上征服过中东，从未有过中国殖民统治中东国家的历史，双方自古以来就以经贸为纽带发展战略合作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未来很可能重新建立丝绸之路，拓展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东亚与中东合作关系的典范。

新时期中美在中东的战略合作与分歧^①

	主要领域	美国	中国
传统安全合作	维护中东地区均势	支持	支持
	维护海湾产油国政治稳定	支持	支持
	帮助剧变国家改善民生	支持	支持
	促进中东和平进程	支持	支持
传统安全分歧	地缘政治利益	维护中东主导权	支持在多边主义 框架下促进中东 地区治理
	战略目标	民主优先	民生优先
	实现中东安全战略的手段	人道主义干预	反对外部势力强 加政权更迭
非传统安全 合作	保障中东能源运输线安全	支持	支持
	打击索马里海盗	支持国际社会一致 行动	支持国际社会一 致行动
	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	支持	支持
非传统安全	防扩散	默认以色列拥有核 武器，反对反西方	支持中东建立 “无核区”

① 表格资料部分来源于张家栋：《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与分歧》，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2期，第54页。

分歧		国家拥有核武器	
	反对中东恐怖主义	打击反西方、反以色列恐怖主义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时期中美在中东既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又存在一定的分歧。首先，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美合作主要存在于维护中东地区均势、维护海湾产油国政治稳定、帮助剧变国家改善民生、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利益、战略目标和实现中东安全战略的手段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的合作主要在保障中东能源运输线安全、打击索马里海盗、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防扩散和反对中东恐怖主义的具体政策上。总体来看，无论是在传统安全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之间在中东的合作远大于分歧，中美在中东建立战略协作关系具有广泛的利益、认知和制度基础。

四、结语

新时期中美竞争更像是冷战的余波，它以一种轻易的近乎传奇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未竟角逐。中美携手创造了大国兴衰的和平过渡历史，中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乃历史潮流。历史上美国崛起后，其霸权下的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导力，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也基本维持了全球格局的整体稳定，尽管没有避免局部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下的冷战思维——这种对抗有时不排除会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摸着石头过河，在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之下，努力实现权力交替。中美携手在竞争进程中消弭了大国争夺的破坏性后果，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种国际责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最主要的是能够在东亚建立双领导体系，以中美战略合作来处理亚太安全问题。^①

和平崛起的阶段性为中国树立了新的目标。美国利用战略优势试图左右多极走势，这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为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提供了外部环境。扩大经济力量并逐渐培养战略根基，保持战略克制，避免美国霸权过早衰弱而引起全球混乱，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积实力，促使战略力量易位，这些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连贯战略整体。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将以此为基础。全球秩序尽

① 参见杨洁勉：《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管深受美国衰落的困扰，但中美和平兴衰决定了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是权力变革的基本模式。^①这是中国崛起所应继续秉持的行动原则，中东则是这一原则的最前沿。与亚太地区中美战略争夺相比，中美在中东拥有较多战略合作空间，如防扩散、反恐、维护能源供应安全、维护海湾等中东国家的政局稳定、维护自由通航、反海盗等。与在其他地区一样，美国谋求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主导权，而中国谋求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不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中美两国在中东战略的兼容性决定了双方战略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Interest Compatibility and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ZHAO Baomin

Abstract: In the twenty years of the so-called uni-polar period,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Overseas interest is now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China is contiguous to Middle East by land and sea, whi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hegemonic power in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pillars of its global dominance.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should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China's Peaceful Rise; Middle East Policy of Big Powers; Sino-US Relations; Strategic Interest

(责任编辑: 孙德刚)

① 时殷弘:《21 世纪初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和中国的应有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